

新中国60年教育历程回顾与前瞻丛书

丛书主编
朱永新

新中国教育实验改革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张荣伟
编著

丛书主编
朱永新

新中国60年教育历程回顾与前瞻丛书

新中国教育实验改革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张荣伟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中国教育实验改革 / 张荣伟编著.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4

(新中国 60 年教育历程回顾与前瞻)

ISBN 978-7-5309-6009-7

I .①新... II .①张... III .①教育改革—研究—中国—1949~2009

IV .①G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1483 号

新中国教育实验改革

出 版 人 胡振泰

编 著 张荣伟

选题策划 张纪欣

责任编辑 贾永来

装帧设计 郭亚非

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http://www.tje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6 开 (660×960 毫米)

字 数 327 千字

印 张 22.75

插 页 5

定 价 40.00 元

新中国 60 年教育历程及反思(代序)

60 年,是天干地支轮转一周的时间。

从 1949 到 2009 年,中国由积弱积贫走向繁荣富强,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到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性转变,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性转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全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中国教育作为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变化,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同时,中国教育也为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回顾中国教育走过的历程,有许多值得我们珍惜的宝贵财富,也有一些值得我们警醒的经验教训。系统地反思与回顾中国当代教育发展的历程,对于我们把握当代教育思想的嬗变,了解各种教育思潮的现实背景,从宏观上把握当代中国教育的特质,是很有意义的。这也是编写“新中国 60 年教育历程回顾与前瞻”丛书的主要目的。

一、中国教育取得的辉煌成就

1949 年以来,中国教育在曲折前进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为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解决了教育发展和实际工作上的若干重大问题,使教育事

业有了迅速发展。

60 年中国教育的巨大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及其子女有了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在旧中国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劳动人民根本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1949 年以来,尤其是 1986 年颁布《义务教育法》、2003 年实施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成功地解决了“穷国办大教育”的难题,所有的人都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逐步从一个人口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大国。我们以全世界 3% 的教育经费,支撑起占世界 20% 人口的教育,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规模。据 2009 年全国各级普通学校基本情况的统计,中国在校学生为 23399.55 万人,其中小学在校生 10331.51 万人,初中在校生 5584.97 万人,高中在校生 4576.07 万人,高等教育在校生 2907 万人。中国在校学生的人数远远超过许多国家全国人口的总和。中国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从 1949 年的 25% 增长到 2008 年的 99.54%。到 2008 年底,实现“两基”验收的县(市、区)累计达到 3038 个(含其他县级行政区划单位 207 个),占全国总县数的 99.1%，“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 99.3%。建立并管理如此庞大的基础教育体系,中国走的是一条其他国家所没有走过的特别的道路。

第二,教育为国家经济及社会发展输送了大量人才,为改革开放和各项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培养了大量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人才。1949 年以来,尤其是 1977 年恢复高考和 1981 年建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以来,大批受到不同程度教育的毕业生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工人、农民和干部队伍中去,逐年改变着社会劳动者技术水平落后、文化素质低下的状况。1949 年,文盲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达 80%,而至 2008 年,全国成人文盲率已下降到 3.58%。从 1949 年到 2001 年所培养的各种专业人才达 3773 万以上,其中毕业研究生 45 万人左右,普通高等学校专本科毕业生 1800 万人左右,40 年培养的各类高等学校的毕业生,相当于解放前 36 年(1912~1949)毕业生的 49.1 倍。这些人才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行各业已经或正在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第三,教师队伍不断壮大,素质逐步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国仅有 205 所高校,其中国立与省立学校 123 所,私立学校 61 所,教会学校 21 所,专任教师 16059 人,而 2008 年的统计,我国已有 2263 所高校,其中独立学

院 332 所,本科 1079 所,专科(高职)1184 所,成人教育 400 所,专任教师 123.75 万人,高校比 1949 年增加了近 13 倍,高校教师比 1949 年增长了近 80 倍。中小学教师队伍也有很大幅度的发展。普通中学的专任教师 2007 年达 491.61 万人,比 1949 年的 6.66 万人增加了 73.8 倍;小学专任教师 561.26 万人,比 1949 年的 83.6 万人增加了近 7 倍。通过对中小学教师队伍的不断补充、调整、培训,教师的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不断提高。1953 年小学教师中,具有中师、高中毕业以上学历的只占 13.5%,至 2007 年已提高到 99.1%,初中教师中具有大学专科毕业以上学历的已达 97.18%;普通高中教师中具有大学本科毕业以上学历的已达 89.3%。目前,一支具有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的教师队伍(包括教育行政和教育科研队伍)已经建立,并逐步稳定。

第四,教育的布局、结构按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日趋合理。进入本世纪以来,在短短四年中连续三次召开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显示了党和政府引领职业教育走向快速发展,为国家建设培养高技能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的决心。60 年来,我国中等教育的单一化结构有了很大改变。1949 年,中国只有 3 所技工学校,在校生 2700 人;中等技术学校 561 所,在校生 7.71 万人。而到 2008 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包括普通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共有学校 14847 所,在校生 2087.09 万人,学校增加了近 30 倍,学生增加了 2000 多万。与普通高中的比例基本达到了 50%。高等教育层次、种类、布局等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普通高等学校本科、高职(专科)全日制在校生平均规模为 8679 人。同时,学科结构基本趋于合理,一大批新兴学科和社会急需的新专业,如电子计算机、能源、环境、材料、生物技术和医疗技术等也相继建立并发展壮大。目前,文、理、工、农、医、财、法、师等主要科类的结构趋于齐全和协调,基本上形成了能适应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

第五,教育理论研究取得了若干成果,为教育决策和教育实践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持。1949 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理论界在许多问题上进行过争鸣、讨论,如关于教育的本质、教育的功能,关于教育的产业化与教师的专业化等,在许多问题上也达成了共识。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发展历史性成就和基本经验研究课题组”的总结,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们的主要理论成果有:“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高考是选拔优秀人才的有效途径”“尊

重知识,尊重人才”“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工作的主题”“教育改革要从体制改革入手”“教育创新是教育发展的不竭动力”“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等18项。另外,从顾泠沅小组大面积提高数学教学质量的教改实验到邱学华的尝试教学实验,从卢仲衡的自学辅导教学改革实验到李吉林的情景教学理论,从吕敬先的小学语文能力整体发展实验到叶澜的新基础教育实验,从裴娣娜的主体教育实验到朱永新发起的新教育实验,许多民间的教育与教学改革实验和国家的新课程改革,也都在理论上为新中国的教育做出了贡献。

此外,我们在民族教育、妇女教育、民办教育、特殊教育、华侨教育、留学教育等领域也有较大的发展。目前,中国教育事业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社会各界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有很大的提高。按照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中国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体制,正在逐步进行着广泛而深刻的改革。

二、中国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毋庸讳言,60年来中国教育也存在着若干问题与失误,只有发现问题、认识失误,才能防止重蹈覆辙,并使中国教育事业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地向前发展。具体来说,中国当代教育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整体教育程度和劳动力素质仍然较低。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我们人均接受教育的水平总体还不高,世界十分之一左右的文盲仍然在中国。九年义务教育的水平还比较低,由于受劳动力素质的制约,劳动生产率、科技创新能力也都比较低。我国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占35%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75%的水平。2003年,我们消耗了全世界钢铁的26%、石油的30%、水泥的60%,才创造了全世界GDP的4%。有人统计,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日本的二十六分之一,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德国的二十分之一;而我们的单位国民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则相当于他们的5倍、2.6倍和3.6倍。这与我们教育发展尤其是职业教育的落后是有密切关系的。

第二,教育发展不平衡,学校之间水平差距过大,教育公平的问题仍然突出。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锦上添花”的倾向,导致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同一区域的不同学校之间差距太大。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外部与内部两个方面。

从外部来看,一是教育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中西部教育落后于东部教育。调查表明,东、西部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一项的差距就超过3倍。由于投入不足,中、西部教育在教育发展水平、“两基”普及、师资力量、校舍建设以及家庭教育支出等方面都落后于东部。如2003年,上海小学生的生均教育经费是3715元,为贵州418元的8.89倍。

二是教育的城乡发展不平衡。从城乡对比来看,近年来全国预算教育经费约60%用于义务教育,其中投入农村义务教育的只有35%左右。教育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

三是教育的群体发展不平衡。社会的不同群体在教育上拥有完全不同的教育资源,相对来说,弱势群体接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比较少,尤其是农村的女童、城市的外来民工子女、特殊教育系统的残疾、弱智人群等,在教育上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从教育的内部来说,一是教育的内部机构不合理,发展不平衡。公立教育和民办教育,正规教育和非正规非学历教育的发展不够协调,各类教育间比例不合理。比如学前教育的普及率只有48%左右,在许多省学前教育经费只占教育总经费的1%左右。再如,全国民办小学4846所,只占全国小学总数的1%;民办中学4571所,占全国中学总数的5.7%;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校只有89所。

二是真正的民间资本并没有进入教育领域,假民办已经成为民间教育资本进入的一个重要障碍。此外,我国高等教育都力求向学术一条线上靠,研究型、研究与教学相结合型、教学型大学以及培训型学院之间也缺乏合理层次结构。同时,我国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重普通教育轻职业教育,重正规学历教育轻非正规学历教育的情况比较突出。

第三,应试教育为中心的模式仍然左右着教育。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体系,使得素质教育难以实施。考试的选拔功能,使中国的教育不断增加难度,学习的内容越来越艰深,大多数学生感觉学习困难,许多农村学生和他们的父

母认为学习内容对于今后的生活根本没有用处,许多城市的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也认为自己孩子学习的东西是一辈子派不上用场的。一考定终身,一白遮百丑,为了好的分数可以不择手段地竞争,学校的高低贵贱也是在考试分数面前排队。

应试教育是一种以考试为目的、为考试而进行的教育,它以考试分数和升学率作为教育的唯一目的,赋予义务教育强烈的竞争性和淘汰性,使许多孩子失去了童年与童心,体质明显下降,如 2005 年 7~18 岁的男、女学生的平均肺活量分别比 2000 年下降了 206 毫升和 122 毫升。

第四,行政化、官本位的色彩仍然较为浓厚,教育决策科学化的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行政级别的强化,使学校缺乏真正的办学自主权,教育决策缺乏社会的广泛参与和监督,一些重大决策如名校办民校、独立学院、高校合并、大学城建设、京剧进校园等,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强势推进,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

第五,教育经费依然短缺,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没有完全落实。中国当代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至今,一直在 3% 左右徘徊,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005 年,一直没有突破 3%,如 1995 年是 2.32%,1999 年为 2.55%,2005 年为 2.82%,直到 2006 年才达到 3.01%,但要实现 4% 的目标,还需作出很大的努力。教育经费的短缺,加上教育经费的分配结构不尽合理,导致学前教育、农村教育相对薄弱。

此外,我们的人才培养结构有待于进一步合理,高技能、创新型人才严重不足,教学方法、内容、培养模式相对陈旧,人民群众接受优质教育的强烈需求与满足这种需求的能力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教育研究对于鲜活的教育生命的疏离,等等。我们的教育仍然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任重道远。

三、中国教育的主要经验教训

60 年的教育发展虽然走了不少弯路,但毕竟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为今后的教育发展准备了条件。我们的使命就是如何在中国这条古

老的航道上,参照前辈留下的航海资料,扬起风帆,开辟新的航线,到达光明的彼岸。

那么,当代中国教育发展的主要经验教训有哪些呢?

第一,教育发展应该以理论作指导,以实验为依据。教育发展一般要经过三个基本阶段,即科学的决策→小面积的实验→大面积的推广,这样才能使教育稳妥而有效地向前发展。因此,既不能搞“无的放矢”的盲目行为,也不能搞急于求成的立竿见影。1949年以来,中国教育的发展往往忽视了这一点。以学制改革为例,建国以来的历次中小学学制改革,虽然也强调要以理论做指导,实验为依据,但实际上缺乏系统而长期的实践,无论哪一次改学制实验,都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中小学教育周期。如上世纪50年代初进行小学五年一贯制的实验,从1950年下半年起到1951年10月1日政务院公布新学制,仅试了一年多。到1953年政务院公布《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停止推行五年一贯制,小学学制仍沿用四二制,分初高两级,也只用了3年不到的时间。再如本世纪初国家新课程的改革,从提出到实施再到全国推广,也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

我们知道,教育的对象是人,而人的成长周期是比较长的,要评估教育的效果,一般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周期。中小学教育的周期在10年以上,像学制改革和课程改革这种比较关键的决策,必须经过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周密而严格的实验才能检验出是否有成效,是否具有推广的价值。在实验或者试点基础上进行的教改,尤其是小规模的区域实验,都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检验的。因此,教育发展无论是宏观或微观的改革,都必须坚持以理论做指导、以实验为依据的原则,国家或教育部门的领导人都不能用自己的个人观点来代替教育决策。

第二,教育发展不能成为政治运动的附庸。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快地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是为了提高教育的效益和效率。但是,60年的教育发展有时却背离了这个根本点,使教育成了历次政治运动的附庸。仍然以中小学学制改革为例,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中小学学制改革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如它一会儿是实现“教育大跃进”的重要措施,一会儿是“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要步骤,一会儿又把是否赞成“学制要缩短”作为“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首要问题。政治形势的多变使学制这种本应稳定的体

制问题处于多变状态。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的改革(如考试)以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问题,本来都是教育的内在要求,但在政治力量的钳制下,这些实实在在的教育科学的问题,都变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很少有政治运动的困扰,但是政治思维模式依然经常影响教育的发展,如大学扩招的原动力是“拉动经济”。

第三,教育发展不能搞群众运动。把教育发展搞成群众运动,表面上看轰轰烈烈,调动了群众办学的积极性,但实际上是把教育作为政治斗争附庸的派生物。在政治斗争的背景下,人们习惯于搞运动,认为只有运动才具有革命的性质,才能从根本上动摇原有的基础,冲破守旧的势力,“推翻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而主张稳步发展、谨慎实验,则难免有改良主义、妥协派之嫌。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搞群众运动成了走群众路线的代名词,只有搞运动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这样的结果自然使教育也成了群众运动:一是一哄而起,只要领导人的号令一下,大家就蜂拥而上,争先恐后地搞起“教改”,不考虑自己的校情,似乎谁的步子越大,速度越快,就越是“革命”。二是一元模式,由于政治成了唯一的标准,多样性、独创性就成了离经叛道。正如美籍华人乔龙庆所评价的:“统一的学制,统一的考试制度,统一的教科书,直至统一的发型。中国这么大,如果什么都搞统一,人就没有创造性,年轻人就不敢向权威挑战了。”

第四,教育发展不能急于求成,盲目冒进。教育的发展不像政治、经济那样,可以在较短时期内出现剧烈的变化,也不像科学、技术那样,可以在较短时期内产生明显的飞跃。教育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渐进影响过程,具有滞后性和缓慢性的特征。那种企图使教育发展一蹴而就、一步成功的观点,那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天方夜谭。我们许多教育政策,如高校扩招、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包括新课程改革等,虽然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多少显得急于求成。我们忽略了教育发展渐变与质变的辩证法,企图人为地缩短教育发展的渐进过程,只能受到辩证法的惩罚。

第五,教育发展应该强化学校的自主权。长期以来,中国教育发展受行政钳制太多,受升学的指挥棒影响太多,学校失去了办学的独立性,失去了教育的自主权。“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不允许教师进行小规模尝试,不允许失败。在这样的基点上,一是形成了教育界对改革讲的人多、干的人少,谁也不

愿“敢为天下先”,谁也不愿偏离一般学校所走的教育轨道;二是造成了局部改革多、整体改革少,浅层改革多、深层改革少的现象。1949年以来,我们虽然出现了斯霞、霍懋征、李吉林、魏书生等一批有影响的特级教师或教改专家,却没有出现像陶行知、苏霍姆林斯基式的大教育家,这与我们的办学体制僵化、学校的自主权太少不无关系。

第六,教育发展应当以扬弃的态度对待别国的教育经验和教育理论。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必需学习和借鉴别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和理论,教育发展也是如此。但我们过去经常采取一种形而上学的态度: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彻底打倒。如对待凯洛夫的《教育学》,上世纪50年代全国教师几乎人手一册,几近崇拜极致,但60年代末又批判其为修正主义的教育“权威”,一脚踢倒;又如对待苏联的教育模式,50年代初全面学习苏联的学校制度和教学内容,高等教育率先按照苏联模式进行全国高校大调整,90年代以来兴起一股高校“合并旋风”,似欲否定既往。在对待杜威的教育理论和方法、对待美国教育模式、对待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等方面,至今也存在这样的倾向,致使教育思想摇摆不定,缺乏连续一贯性。其实,即使是别国成功的教育理论或经验,我们也应采取扬弃的态度,既不自盲从也不盲视。

四、中国教育未来发展的建议

教育兴则民族兴,教育强则民族强。

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思在《好社会:人道的记事本》中这样写道:“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民是贫穷的,也没有任何一国愚昧无知的人民是不贫穷的。在民智开启的地方,经济发展自然水到渠成。”“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学识、开明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利害攸关的力量所在。”教育是未来的事业,赢得未来首先要赢得教育,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仍然面临许多艰巨的任务。

从中国教育的实际来看,当务之急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各级政府应该加大教育的投入,保障教育经费的三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的总经费增长了150倍,近年来,国家先后实施了免费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其中2008年中央财政用于教育的投入就由2007年的1076亿元增加到1562亿元。但是由于教育上的欠账太多,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依然存在。所以,不能认为教育的投入已经差不多了,而是应该继续优先发展教育,加大各级政府对于教育的投入。希望国家能够努力兑现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4%的目标,在中央财政有困难的情况下,可以先要求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应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的20%。建议尽快建立分类指导的义务教育国家基准,保证所有地区所有学校的水平有一个最起码的标准,为保证这个标准的实施,必须实事求是地确定财政教育经费的分级保证与转移支付的比例。

第二,重新认识与思考教育的本质,回到教育原点。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教育哲学的思考,需要教育思想的引领。首先解决教育的根本问题,想清楚教育是什么,什么是好的教育这样的根本性问题,教育才有正确的方向,投入才有真正的效率。我们似乎都知道,教育是一个培养人的事业,教育不仅仅是给孩子分数,而要为孩子的生命奠基。但是,在我们的中小学教育生活中,分数恰恰成为教育至高无上的追求,成为衡量教育品质的标准。在我们的大学,就业成为最急迫的任务,成为判断大学最关键的指标。分数与就业,成为我们整个教育的原点,成为教育的重要追求,这是中国教育许多问题的根源。

教育是一个培养人的事业,是一个通过培养人,让人类不断走向崇高,生活得更加美好的事业。因此,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塑造美好的人性,培养美好的人格,使学生拥有美好的人生。判断教育的好坏,应该从这样的原点出发;推进教育的改革,也应该从这样的原点开始。美好的人性,应该从幸福的童年开始。把童年和童心还给孩子,这是教育的基本要求,人的一生其实是围绕童年展开的。教育不仅是为未来的幸福做准备,教育生活本身就应该是幸福的。这样的幸福不是简单的感官的快乐,而应该是完整和谐的。因此,给孩子多样化的教育,发现每一个孩子的世界,帮助他们获得多样性的发展,这是教育的重要使命。

所以,我们的教育面临着一个“再出发”的问题。我们应该追问教育的原

点,应该进行教育的启蒙,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提高全社会的教育素养,应该让每一个公民重新认识教育,思考教育,理解教育的使命。

第三,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教育公平。科学发展观在教育上的关键,在于各级政府应该做好教育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在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的同时,多一些雪中送炭,少一点锦上添花。要坚持教育的公益性性质,建成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首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要大力扶持农村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的教育,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和残疾人的教育问题。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的重大举措。

第四,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公平与效率始终是教育发展不可偏废的问题。在做好教育公平的同时,我们应该努力提升教育品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推进素质教育的关键是改革我们的考试与评价制度。“以考为本”在很大程度上使教育丧失了满足人的发展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本性,使“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难以真正落实到教育上来。改革考试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打破一考定终身的格局,建立高考的立交桥,破除公务员与企业录用人才的学历壁垒,让不同类型的学生在任何时候都有成长与发展的机遇。

第五,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教师是教育的关键,教师素质尤其是农村教师的素质,是影响中国教育品质的最重要的因素。没有教师队伍素质的全面提高,永远没有好的教育。应该认真研究教师专业发展的规律,推动教师自觉地走专家引领、行动反思、共同体互助的道路,为教师的进修研究提供最好的服务,让他们能够真正地享受教育的幸福。

第六,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教育生活之中。要在全社会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推进和谐文化建设,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培育文明社会风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就谈不上凝聚力。所以,应该通过共读、共写、共同生活,把这些共同理想、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融进我们的教育中。

以上是我们对于60年中国教育发展历程的一个回顾与反思。由于水平和眼光的限制,许多观点与思考难免不够全面深刻,只是一家之见,希望方家

指正。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套丛书也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一部分教育界、出版界的会员,献给新中国 60 年庆典的一份礼物。策划编辑张纪欣先生、责任编辑田昕女士都是民进会员,霍力岩、程方平是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的委员,著名学者肖川是民进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的教授。杨东平先生和我的学生张荣伟博士、何小忠博士也都是民进之友,东平兄曾经多次参加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的参政议政调研和会议。以上诸君都是造诣精深的学者,都有着繁重的教学与科研任务,也都有着自己的写作计划。承蒙他们的信任,拨冗参与撰稿,并且推我牵头召集这套丛书的编写工作。这套丛书从今年 2 月启动,前后只有六七个月的时间,但是他们凭着对于教育事业发展的满腔热情和对于国家民族强盛的殷切希望,凭着自己深厚的积累,最后都如期完成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为我们民进会员的敬业精神而感动。

最后,感谢天津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没有他们的全力以赴,没有他们的热情、坚韧、细致与耐心,也许我们早已放弃了这个计划。

朱永新
2009 年 8 月 16 日

前言

“教育实验改革”界说

一

在关于教育研究、教育发展和教育创新的各类话语中,“教育实验”与“教育改革”是两个紧密关联的概念,而且常常可以互换使用。本书就是这样。

不仅如此,当“教育实验”与“教育改革”并存或交替出现,难以区别或不必要严格区别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教育实验改革”这一比较宽泛、模糊的合成概念来代替它们。这是本书取名《新中国教育实验改革》的一个基本思路。

二

在本书中,所谓教育实验,主要指为了进行科学研究而进行的有所监控的教育实践活动;所谓教育改革,主要指有目的、有计划地对落后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施加影响,使其获得预期的进步和发展。一般来讲,教育改革是为了推行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案,但为了避免草率从事,常常要通过教育实验来证明其有效性和可行性。可见,教育实验既是一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也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实践活动,它应该是具有科研性(尝试性)的教育实践活动与具有实践性的教育科研活动的统一。

教育实验常常成为教育改革的先导。之所以开展教育实验是为了发现典型经验,寻求教育发展规律,更好地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教育实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教育实验就是教育改革。现实中,教育改革往往以教育实验的形式展开,或者说,教育实验往往成为教育改革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教育研究、教育实验和教育改革成为教育发展与创新不可分离的基本环节。这里,教育改革的实验性、科学性与教育实验的改革性、创新性表现为:教育改革的过程和手段往往体现为教育实验,教育实验的最终目的往往表征为教育改革和教育创新,即变革教育、完善教育。可见,教育实验与教育改革都是一种探索和创新的过程,都是为了谋求一种新的教育、一种进步的教育、一种理想的教育。两者的价值追求是共同的、一致的。

三

在关于“教育实验”和“教育改革”的话语中,有时还会出现“教育创新”、“创新教育”之类的概念。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教育实验”与“教育改革”更多的是强调教育发展的过程性概念,而“教育创新”、“创新教育”更多的是用来强调教育实验或教育改革的目的是和结果。

无论是强调现实性、操作性和推广性的所谓“宽泛论”的教育改革,还是强调客观性、准确性和理论验证的所谓“严格论”的教育实验,都具有变革教育、创新教育的基本特性。可以说,教育实验改革就是为了教育创新和创新教育,创新乃教育实验改革的终极价值所在,也是教育实验改革的要义所在、本质所在。当然,“教育创新不是一个空泛抽象的口号,也不是时尚的思潮,决不能满足于一般提出的所谓新看法、新举措或引入国外一些新概念、新思想。教育创新是一个严肃认真、扎扎实实的研究和行动的过程”。“教育创新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一些表面性问题或问题的浅表层次的关注,需要深入下去,搞清真正的问题和问题的症结所在。而面对一些已经被遮蔽、被扭曲的问题,则更加需要彰显本真、正本清源,而不是就问题谈问题、想对策”。^①这段话以教育创新为角度,较为全面地阐释了教育实验改革的可能意义与操作要求。

^① 朱小蔓主编:《对策与建议——2003—2004年度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分析》,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